

“关于小孩的名字,我叫卬甫弟提的,不知你认为适当,‘吴念琪’……”

这封六十年前为我取名的信寄予父亲,落款“你的妈妈周惠珍。”其实,她是范琪的妈妈;信里“卬甫弟”是范琪叔叔范卬甫。因我随母亲姓,遂成“袁念琪”。

范琪和父亲相识永安公司,皆为练习生;他在糖果部,父亲在化妆品部;共同志向父亲成了好友。他们常躲厕所、货仓,学马列和进步书籍,读解放区报纸。还办秘密刊物《小草》,把创作的小说、散文、诗歌和漫画,抄簿子上传阅。后又增加我根据地《战斗报》《浙东日报》和《苏北日报》要文摘要,毛主席《论持久战》和《新民主主义论》等片段;还有新四军战斗故事、根

常回家看看

孙博

那时,我住在学校的教工宿舍,整天瞎忙。有一天中午,60多岁的父亲突然出现在寝室门前,我感到万分惊讶。问他缘由,他搪塞说路过这儿,进来看看。那时没有地铁,交通十分不便,他要倒好几辆公交车,穿过半个上海城,才能到达我所在的大学。那时也没有手机,联络困难,如果父亲大老远来了没碰上我,岂不是白跑一趟?

见他一味地从上到下打量着我,似乎确认我没有缺胳膊断腿,我这才恍然大悟,已经有四个多月没回家了,感到尴尬而又惭愧……从此以后,我工作再忙,也坚持每个月回家一次。

没过几年,我移居加拿大。如今,漂洋过海已过28个年头,两地隔了个太平洋,“常回家看看”成了遥不可及的奢望。但无论如何,我每年都要回国一两次,看望他老人家,好在有哥哥姐姐照料,但内心还是感到很愧疚。只要有一丝机会,我都会尽力赶回家看看,记得有一年去北京开会,为了看望父亲,我搭周六最早的班机到上海,当天坐最晚的班机回京……

近半年来,我对“常回家看看”,有了另一种“切肤之痛”的认识。大儿子一年前大学毕业,就搬到了市中心居住,离公司近在咫尺,但离开我们住处有30多公里。屈指算来,他平均一个多月回家一次,通常不过夜。内子对他早有不满,好在都被我耐心说服了。人与人之间需要相互理解,作为父母应该尽可能谅解孩子,他们在职场上的拼搏并不容易。再说,我们两口子身体都健康,也没到非要孩子照顾的时候。

儿子的工作确实很忙,平时都是根据项目走,在外时间多,这也成了他很少回家的正当理由,说来也是情有可原的。最近,儿子已经超过两个月没回家,母子连心,内子常常坐立不安的,十分担心儿子的身体。恰好遇到他的生日,我们借口叫他回家一起吃顿饭,但提前两周跟他预约,都未能如愿。内子只好在电话里命令他,过生日前一天必须回家。

儿子识相地回家那天,内子从上到下打量着他,连连说他瘦了,如同当年父亲到学校打量我一样。晚餐后,内子终于忍不住向他摊牌——对他回家次数太少强烈不满!我与他详细解释“儿行千里母担忧”的道理后,也第一次向他吐露了我的陈年糗事,他听后马上答应一个月至少回家一次。我也婉转地告诉他,有时真的太忙也不必拘于形式,只要让我们少一分牵挂即可,他会意地笑了笑。

三周后的一个晚上,内子的电话突然响起来。原来,是身在纽约的儿子破天荒地要求视频通话。问他有什么事,他说只是告诉我们,下周要回家住一晚,通话总共五分钟。这个漆黑的夜晚,突然变得明亮起来,我们两口子兴奋得难以入眠。

据地见闻等。

范琪生于1926年2月20日,7岁丧父,由母亲养大。为家中唯一孩子,也是范家三房合一子。下班后,他去俄语夜校学习。那里的教师、同学送他苏联领事馆电影

我名字里的“琪”

袁念琪

票,使他更了解革命和社会主义。为增强体质,每天清晨从所住三牌楼(今蓬莱路)跑步到慈淑大楼(今东海大楼)的精武体育会练拳,然后上班。

在黎明前最黑暗的1944年。交通员朱印天带父亲、范琪和胡茂祥去浙东根据地。途经浦东,被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淞沪支队挽留。父亲和范琪于参

军当年入党,范琪半年后提副指导员。

抗战胜利后,我党撤出浙东等解放区。淞沪支队编为纵队一支队,后与五支队合为新四军1纵3旅7团。1947年,整编为华野1纵3师7团。1948

年,22岁的范琪牺牲。上海解放后,父亲认范妈妈为母亲;我叫她“好婆”。

范琪衣冠冢在永安公墓,父亲一直想寻得遗体。1975年10月12日,我跟父亲到了当年战场河南睢县。

1948年6月,我军发起睢(县)杞(县)战役,活捉区寿年、消灭其兵团75师和新21旅,并把72师围于铁佛寺。蒋介石令邱清泉、胡璉和黄伯韬兵团救援,与空军司令周至柔飞战地上空督战。

黄兵团进至与铁佛寺一村之隔帝邱店,7团楔入敌增援与被围部队间的柴砦。如柴砦失守,72师将突围。范琪所在3营坚守柴砦西北王老集东30米一小土包,敌在飞机、坦克和重炮掩护下猛攻。

战前为团政治处组织干事的范琪,因坚决要下连而被任命为9连指导员。这个新兵连打得只剩40多人,干部只有他、文教李文龙和副排长张生友。

父亲和我租了县委招待所自行车,向柴砦骑去。见村就问:“有没有埋过打仗牺牲的?埋时有没有棺材?”

那时,牺牲的干部有

棺,战士裹布;有的村埋过但无棺。我们来到第9个村子,一问是埋过棺材,有两口!

叫窦锐生的中年人说:“那时我十三岁,仗打完跟大人回家。看到大坟堆旁的棺材插着木牌,写夏白烈士之墓。”

他记得是夏天的“夏”,白色的“白”。问他另一棺的木牌是否写“范琪”?夏白和范琪同在7团,夏是1营教导员。父亲写下“范琪”两字递去。他说,好像有个“范”字。

这里是董店公社陈楼大队田堂一队,位于柴砦南2.3里。队长窦振友说,夏白的油松棺材是刘传高他爷的,范琪那桐木棺材是刘金早他爷的。夏白葬村东角,现是一片棉田。范琪葬村南,老乡指着田边的小土堆说,就在这里。

1948年7月6日下午,小土包东北1营所守房屋被攻陷,危及柴砦。上级令9连派一个班夺回。范琪令李文龙留守阵地,自己率战士冲向屋子,不幸腹部中弹……

范琪的遗体放在大车上,李文龙大哭:“人像活着一样,就是脸色苍白,也未见大量血迹。”他在给我父亲的信中写道:“他不该牺牲,这任务完全可以由我担任。”

当年的屋子和小树林已无踪影,范琪倒下的地方成了打谷场。太阳慢慢沉入平原的地平线,矮土墙围起的村落,升起晚霞染红的炊烟,似绸带轻舞。

1975年冬,范琪遗骨迁入河南省睢杞战役烈士陵园。



母与子 (油画) 龙力游



最后的心愿

简平

母亲病重的时候,我们将她送去了医院,还想方设法让她住进了急诊病房。我们稍稍放下心来,以为这里设备齐全,医护人员始终都在工作状态,病人可以得到及时的治疗。我们对母亲说,这里要医生有医生,要设备有设备,救治条件完善,你就在这里安心医治好了。虽然经过输液,母亲退烧了,血压也已回升,但她在看到自己的检查报告后,得知肝肾功能已经衰竭,于是,出人意料地提出办理出院手续,这让我们很是惊讶。别的病人病重时,总是想着能去医院,但母亲偏偏与别人不一样,她认为当生命进入倒计时后,应该放弃无谓的抢救,回到家里,在亲人的陪伴下,安静地离开这个世界。

可是,我们没有同意。

不日,母亲的病情急转而下,再度高烧,没有小便,黄疸增加,血小板锐减,医生下了病危通知。母亲浑身难受,既不能躺,也不能坐,整个人趴在病床前头翻下来的用餐架上。她把我们叫到身边,要求即刻回家。她说,我知道自己情况不好了,但我不愿意这样待在医院里,我不害怕什么的,我活得心满意足,现在只想回家去。我们不断地宽慰她,但母亲却越喊越响:“我要回去!我要回去!”我们听了,揪心之至,但我们三兄妹觉得谁也做不了这样的决定,我们还是认为应待在医院,这里所有的抢救设施,一切都可以应对。

时间已经入晚。已经一整天趴在用餐盖上,叫着要回去的母亲显然已精疲力竭,但她就是躺不下来。她说,你们为什么不让我回去,我在这里一刻也静不下来,这有什么好的!我们心想,我们只是按照通常一般人的做法,觉得病人在医院里才是最稳妥的。突然,母亲跟我们说,我是写过遗嘱的,上面写得很清楚,当病危的时候,不要插管,不要浪费医疗资源,不要用仪器来维持生命,离开医院,在家里安静地离去。虽说之前我

知道母亲有过这样的意愿,但我根本没有上心,我以为真到了那一步,就由不得她自己了。所以,母亲此刻的执著让我非常震撼。我问母亲,如果你现在回去,你可以躺下来休息一会了吗?母亲说,我只要一到家里,立刻就定心了,立刻就躺下来了。我又问,如果你回家时,在车里躺不下来,只能坐着,你坐得动吗?母亲用坚定的口气说,坐得动。

我听后,立刻明白应该选择什么才是正确的了。我相信,为了能够实现自己的愿望,母亲是会拼尽全力的。于是,我对母亲说,好的,那我们现在就回家去,我们一定都听你的,让你满意,我们会一一满足你的心愿。母亲连声说好的好的。这时,我的妹妹闻听这样的决定,泪如雨下。

凌晨1时30分,朋友的面包车抵达医院,我们先将车子里的坐椅拆掉,然后,用推床将依然打着点滴的母亲推到楼前。当母亲被送入车内的时候,她长长地吁出了一口气。真的就像母亲自己所说,她一到家里就平躺了下来。后来,母亲坚持着要我们拔除最后的两根输液管,一根是维持血压的,一根是补充营养的,我们心里很清楚,一旦拔除,那

母亲的生命也就终止了。我们当然不忍心,不舍得。母亲安慰我们说,你们不是希望我不要有痛苦吗,所以,我能走得越早才好;母亲还说其实今天是个好日子。我们一刻也不离开母亲,紧紧地握着她的手,抚摸着她的脸庞和头发,直到听不见她的呼吸。

我想,只有真正热爱生活、珍视生命的人才会如此坦然地面对生死,并主宰自己生命的归宿和方向。不一样的母亲一直说她心满意足,这应是蕴含了她在人生中按着自己的意愿,一次次地安排了自己的生活,永不慌乱,从不冷漠,她将这看作是最完美的人生。

超市购物,最后一个程序是通过收银台。面对收银台前好几个长长的队伍,到底如何选择站队,跟在哪家队伍后面也需要动用眼力来判断。

首先是看队伍长短。这一条最为直观,人人明白,毋需多言。

其次要看购物多少。队伍虽长,但队伍中的顾客购物少,“通关”速度未必慢。队伍虽短,但顾客购物车里塞满东西,速度自然快不起来。

除此之外,还要看动作快慢。收银员业务熟练动作快,顾客“通关”就快,反之亦然。根据我的经验,女性收银员的速度通常要比男性收银员快一些。

最后是看支付方式。队伍中用现金支付者多,收银员要点钱、找零和检验纸币真伪等,速度就慢。如多为微信支付、支付宝、还有各种支付卡等,通过速度就快。不过,这一点在选择站队时是无法直接考证的,总不能直接问人家怎么付款,弄不好会被误认为“居心不良”,只好采用间接法——看顾客的年龄。一般来说,老年人多的队伍,货币支付较多;年轻人多的队伍,大都直接拿出手机扫一扫。

当然,也有“人算不如天算”的情况。本来还在队伍末尾,忽然旁边原先竖着“暂停”牌子的收银台开始重新工作了,就有可能实现“弯道超车”,一下子由“屈居末尾”变成“名列前茅”,这就与上述几种情况都不搭界了。

另外,如今有些超市已经开设了自助收银通道,遇到不会使用的顾客超市还会安排专人指导,不过,这一新生事物目前还不能完全替代传统的人工收银。“传统”和“自助”两种收银形式,目前看还会共存,让不同的消费者各得其所。至于这“一小步”是否能成为迈向无人超市的“一大步”,那就只能是仁见智的问题了。

与时俱进的收银台

王纪铨



母亲的牺牲精神

邓乃刚

母亲更关注我们的学习,连续十多年为我们订了《小朋友》《儿童时代》《少年文艺》等杂志,姐姐上初中后,又订了《人民文学》。我上四五年级时,就已读了《林海雪原》《水浒传》等十多本书。这些杂志和书,都是母亲按时寄来的。现在回想起来,今天能给报刊写点文章,是因为这些书籍一直伴随我到高中毕业。

那时,母亲也曾想过把自己亲生的两个儿子弄来,但也只是想想而已。随着进京户口的收紧,若全家回来,没有户口,爸爸找不到工作,也没有住房,靠妈妈一个人绝对不行。母亲只想将来情况好了,把全家都弄回来,

母亲回京后,先是给人当保姆,每月挣10元钱,除自己花用一两块,其余全部寄给父亲,供给儿女。公私合营时,母亲进了一家针织厂,后来和一家鞋社合并成立了北京三八鞋厂。这时母亲每月能挣18元钱,她拿出10元寄给父亲,其余为儿女买衣服鞋袜等,我们脚上的球鞋,当时后山人连见都没见过。

谁知这种愿望越来越成了空想。直到1972年春父亲去世,全家也没能团聚。

1960年秋,失散多年的二哥也找回来了。那几年,我的父母供着4个中学生,这在乌盟农村是绝无仅有的。1961年夏我读完初一,一个人来北京做手术。伤口痊愈,母亲依依不舍地把我送到顺义汽车站。我留着眼泪舍不得离开,但她还是含泪把我推上车。母亲说,把你留下了,你姐姐怎么办?二哥和你弟弟怎么办?妈再也没能力供给他们上学了。当汽车开动的一瞬,我忍不住大声喊着“妈妈”,母亲一人站在人群外,早已泪流满面。

由于父母的坚持,我们姐弟4人都读完了高中,有了一份工作。1977年恢复高考,我和弟弟又相继上了大学。母亲自始至终没有和父亲离婚,一个人孤苦艰难地度过了大半生,今天的人是会理解的。然而,如果没有父母的巨大牺牲,不知道还会有我们的今天……

十日谈

不一样的母亲 责编:殷健灵

妈妈似乎有用不完的好心情,像个无忧无虑的超龄小公主,她的身体里应该装了个异常轻盈的灵魂。